

新史學之路

杜正勝 著

三民書局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新史學之路
Nouvelle Histoire 新史學之路
Nueva Historia 新史學之路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新史學之路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新史學之路
Nouvelle Histoire 新史學之路
Nueva Historia 新史學之路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新史學之路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新史學之路
Nouvelle Histoire 新史學之路
Nueva Historia 新史學之路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新史學之路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新史學之路
Nouvelle Histoire 新史學之路
Nueva Historia 新史學之路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新史學之路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新史學之路
Nouvelle Histoire 新史學之路
Nueva Historia 新史學之路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新史學之路

少 年 之 行

1 2 3 4

少年之行

新史學之路

修正格 著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史學之路 / 杜正勝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2004

面；公分

ISBN 957-14-4027-2 (平裝)

I. 史學—中國

619.2

93002965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新史學之路

著作人 杜正勝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4年5月
編號 S 600230
基本定價 捌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027-2 (平裝)

序

1990年一群朋友和我揭櫫新史學旗幟，共同推動歷史研究的改造，這本集子是過去十來年我關於方法學和學術史的論述。

我的新史學觀念是有發展的，可以分作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社會史對舊社會史的革命，亦即是歷史血肉對歷史骨骼的革命。「革命」這詞比較鮮明，其實是舊的擴充，是舊的增益，是新摻入舊，是新融合於舊，沒有要棄絕原來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意思，我們使用骨骼與血肉的比喻，態度就很清楚了。

回憶 1992 年春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烏來舉辦第一屆「歷史研習營」，我發表了「什麼是新社會史」的專題演講，也首度公開論述中國古代物怪的研究。那個研習營洋溢著一股蓬勃的生氣，講員、學員融成一片，新社會史，目標雖然模糊，方向卻很清楚，大家躍躍欲試，要探索這個新領域的究竟。我沐浴在這股熱情中，心中不禁升起一絲憂慮，對學員說，真擔心他們走上這條路會「出師未捷身先死」。事實證明我過慮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不少學員十年下來已成為有名的學者，他們走上新史學這條路，並沒有受到不合理的壓抑。

就在我推動新社會史研究時，我也從學術的象牙塔眺望這座塔所植基依存的社會，這個社會正在沸騰，這個社會正在脫殼，這個社會正企圖羽化，我便情不自禁地擦落去了。擦落去，思想重於實務，教育文化多於政治社會，於是催化出我的第二階段的新史學。

這是一個史學新視野對舊視野的革命，一個世界觀的革命，也是一個人生觀的革命，破除過去的牢籠，走出中國疆界研究歷史。說「革命」，也許太火爆，太敏感了，在現在臺灣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如實說，

這個轉變應該是一種擴大，一種解放，一種使學術和生命更融合的「革命」。

第二階段的新史學在現在的臺灣，對很多人來說是頗有危險感的，也有點無所適從，壓力不像第一階段只限於史學小圈圍而已。第二階段的新史學，觀念很簡單，實踐則還有一段距離，因為我們缺乏基礎，一時之間不像第一階段起得了高樓。但弔詭的是，觀念不改，恐怕永遠無法實踐，新的高樓將只是海市蜃樓而已。

孔子說，憑著《春秋》，有的人會了解他；但也有人會怪罪他。五十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基本上是以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不證自明的前提而從事的實證研究，缺乏深刻的反省力，沒有足夠的比較檢證力。個人在實證研究之餘，做了一點反省，觀照社會，逐漸摸索出一條小小的路徑，談不上什麼史學思想，不過倒給自己的人生抉擇尋得一些理據。

路是人走出來的，不管康莊大道或是山谿小徑，只有按照自己的思索和認定，直道而行，才是正路。曾參說過：「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條新史學之路只是我性之所向，心之所安，並沒有，也不必有任何重或不重的道德感；不過漫漫長路，非具有恢弘之氣度與堅忍的毅力，根本不能上路。

走筆至此，令我想起夸父逐日的神話，而二、三十年前我為自己取字「夸父」，回顧來路，不覺莞爾。人生走的路，自己好像可以安排，但又像無法安排。然而歷史研究的大道，眼前看得到的即使無法踐履，一些淺見仍不妨藏諸名山，以待來者。

甲申 2004 年 1 月 13 日

記於臺北外雙溪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史學之路

序

■ 一、方向之探索

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	3
什麼是新社會史·····	22
中國古代史研究——臺灣觀點·····	38
臺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	55
一個新史觀的誕生·····	66
歷史的再生·····	79

■ 二、前賢的鏡鑑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	91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	119
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	157
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李濟·····	174
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	216
通才考古家高去尋·····	234
北方文化研究之先導·····	264

■ 三、實踐與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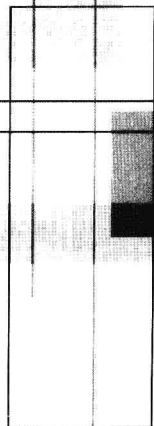
新史學基地的剖析——史語所七十年·····	273
舊傳統與新典範——史語所七十五週年·····	297
新史學經營四題·····	319

■ 四、學術與生命

對待中國文化史的態度	331
無微不至的學風——夏史答問	341
學史的態度	354
徘徊於素書樓門牆之外	358
歷史學家的職責	367
追尋歷史的生命力	371
索 引	394



方向之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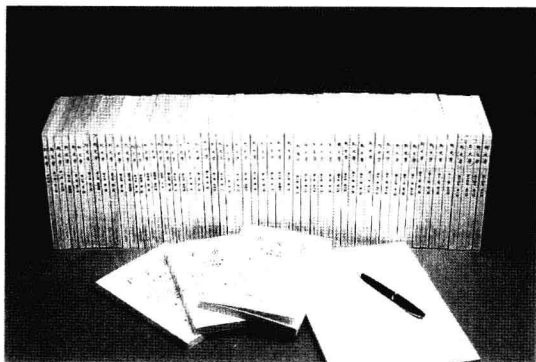
新史學之路

—— 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

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史學期刊《新史學》

1990年春天，以中央研究院青壯輩的歷史學家為核心，結合當時臺灣有活力的同行，創刊一份新的歷史學術刊物，稱作《新史學》。十餘年來《新史學》甚獲好評，一般認為是最具有資格代表臺灣史學界的刊物，它要扮演的角色，有點接近 *Past and Present* 在英國，或 *Annales* 在法國。我沒有要拿剛剛進入第十三個年頭的《新史學》和已經出刊五十年的 *Past and Present*，以及超過七十年的 *Annales* 作比較的意思，不過舉大家所熟悉的歐洲史學期刊作比喻，也許可以比較容易理解這個課題。

《新史學》期刊沒有國王，它是由我這個世代以及年輕一輩的學者所共同組成的史學社群。然而作為這份期刊的創辦發起人、期刊名稱的裁定者和發刊詞的撰寫人，應該有資格來向各位說明臺灣的史學改革——也就是新史學運動。臺灣不是一個大國，在現代世界學術圈裡，處於邊緣地帶，不會引起世人的注目。不過，過去五十年的發展，臺灣在各方面的改變和成就，形成所謂的「臺灣經驗」，對轉型社會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臺灣經驗，除了世人熟知的經濟奇蹟和寧靜政治革命外，還有文化轉型和調適的問題，後者還談不上作為成功的典範，目前



新史學

毋寧說正陷於混亂的狀態，但它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混亂」是表現在國家、民族或文化認同的矛盾、衝突，在各種學門中，史學與這個問題的關係最密切。如果能從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的變革分析臺灣當前認同的歧異，也許可以作為人

類探尋自我和調適文化的一個樣本。那麼臺灣作為社會科學的實驗室^①，在經濟、政治之外，還有文化的意義。

《新史學》期刊是史學改革運動中與現實社會保持較遠距離的一環，但如果不把它放在臺灣史學脈絡中觀察，也無法真正了解。2002年我應邀到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報告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除了介紹史學社群內學術的傳承與轉變，也考察臺灣歷史學者與時代社會的互動，回顧過去，並思索未來新史學的道路。

臺灣史學的起點：1950年

臺灣的史學發展當從1950年開始，在此之前，清帝國二百一十二年(1683–1894)的統治沒有培養學問家^②，日本五十年(1895–1945)殖民後

① 這裡借用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陳紹馨教授的概念，他在1966年發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收入他的《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② 《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卷七〈人物志〉，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以及臺灣清朝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可以證明我的論斷。

期建立的短暫學術傳統，當她戰敗退出臺灣時，也隨之斷絕。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有一些歷史學者隨之來臺，其中的領袖人物可以算作近代中國新史學的第一代人物。過去五十年臺灣的史學是這批人及以後幾代學生的業績，所以臺灣的史學傳統，離不開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發展的新史學。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前一年(1944)出生的臺灣人，在國民黨退守臺灣並且宣布長期戒嚴的第二年(1950)進入小學。《新史學》的發起人和我一樣都不曾受過日本教育，都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中長大。像我1960年代中期才就讀大學的這個世代，大多受教於中國新史學的第二代學者，只有一些人有機緣接觸到第一代歷史家，我是少數幸運者之一。

逃避共產黨而來臺灣的第一代歷史學者，思想上多屬於自由主義，或多或少帶有民族主義，即使有一些社會主義，但普遍都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聚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和臺灣大學歷史系。當時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1896–1950)，同時也是臺灣大學校長；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同時也在臺大歷史系任教。1950年史語所是臺灣唯一從事史學研究的機構，臺大是臺灣唯一培養歷史學者的學校，因此討論臺灣史學的發展，不能不溯源於史語所。

史學以求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1928年成立於廣州，創辦人是上面提到的傅斯年。傅先生是北京大學文科高材生，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畢業，赴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學習他在中國早已嚮往的實驗心理學，受教於權威學者 Spearman 教授。傅先生早年是個「科學迷」，相信自然科學方法具有普遍意義，故多涉獵科學方法的通論著述。他在倫大三年多，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讀近代物理學，不久轉而攻讀藏語、梵

文等東方語文^③。不論在中國或歐洲，傅斯年雖然都不是歷史系科班的學生，但當 1926 年返國時，他的史學思想已經成形，準備在中國進行一場深刻的史學革命^④，第二年傅斯年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同年蔣介石的政府在南京成立，當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1868–1940）創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是蔡先生北大時期的學生，乃建議蔡先生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以研究自然科學為目標，史語所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個人文學研究所，甚至也可以說是 1950 年以前唯一的人文研究機構^⑤；把人文學者放在自然科學家之中的特殊結合，與傅斯年的歷史學有密切的關係。他向蔡元培院長解釋史語所研究歷史，只要使用新工具，增加新觀念，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同列，他並且保證，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如果不能符合自然科學的要求，史語所就沒有設立的必要。傅斯年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看待歷史學，這是他從大學到歐洲留學一貫的態度，借用他的話說，歷史雖是舊領域，但史語所採用的新工具和新觀念則可為它注入新的生命^⑥。雖然早在 1902 年清帝國改革派梁啟超發表過〈新史學〉一文，提出一些新觀念，但論近代中國新史學運動，還是以 1928 年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目標和方法最為鮮明，可以當作發軔的

③ 參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頁 37–53。

④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1995：12；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以上二文收入本書改題〈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下篇。

⑤ 1929 年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所，1934 年取消，其民族學研究併入史語所。

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史語所檔案」，元：198 之 1。

代表而無愧。

傅斯年新史學的特色是確定第一手史料的權威性，譬如檔案、碑刻、日記、書信等。歷史研究仰賴這種史料在近代歐洲，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雖然已變成常識，但在文獻著述傳統極深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新觀念。何況他建立的史語所研究團隊最關心的方法是利用考古發掘、語言和民族調查所獲得的新資料研究歷史，這種努力擴充研究資料的制度即使放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學術潮流，也一點都不遜色。傅斯年的名言：「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⁷可以作為史語所新史學最生動的寫照，和最扼要的宣言。

傅斯年的史學方法在擴充新材料之外，還有一點是擴充新工具，他所謂的新工具即是新學科。當時他認為對歷史研究有幫助的學科如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和天文等，史語所則發展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一般來說，考古學、民族學與史學的結合比較成功，語言學和歷史學自從建所以來就不曾充分整合。後來由於種種因素，1950年代民族學部分獨立成為民族學研究所，而語言學部分也在長期的醞釀後，終於在二十世紀快結束時分離了，那時我是史語所所長，距離創所將近七十年。

我比較詳細地介紹傅斯年在1928年所提出的新史學思想，重視史料這點不但為1950年以後在臺灣的史語所所繼承，也因為史語所屬於臺灣史學界的領袖地位，影響相當深遠。史學基本工作在於考訂史料的真偽，這種尊重資料的求真態度遂成為臺灣史學的共通成分。即使後來有人不滿意傅斯年或史語所把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抬得那麼高，對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的口號也有所曲解，但他們絕不挑戰「史學追求真相」這個嚴肅的任務，因為歷史研究如果懷疑或放棄求真，那麼學術距離政治就

⁷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上(1928)。

不遠了。這是 1950 年以後之臺灣史學與中國史學最大的差異之一。

然而傅斯年所重視的史料傳統文獻以外的新史學——田野的新史料，這點在臺灣並沒有深入到歷史學界。只有史語所努力地奉行這個原則，1960 年代該所進行一項大規模的集體研究，在所長李濟的領導下，撰寫《中國上古史》，就是利用考古發掘資料而建構古史的新史學⁸。

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

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臺灣，歷史學者雖然沒有充分說話的自由，但可以有不說話的自由，不像中國連後面這點小小的權利也被剝奪了。1950 年以後的臺灣歷史學者，只要不去碰觸政治禁忌，基本上是可以享受有限度的學院自由的。以研究史料為主的史語所遂能被戒嚴的大環境所容忍，而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從事脫離人群、社會與時代的歷史研究。諷刺的是，與世隔絕絕非傅斯年的行徑，他個人參與很多國家大政的討論，也發表強悍有力的政治評論，毋寧是太關注時代與社會了，然而他的史學思想卻塑造一個與他自己的風格完全不同的研究團隊。

來到臺灣，傅斯年的任務是出掌臺灣大學，可惜不到兩年，便因病去世（1950），對臺灣大學的歷史研究產生影響的是他的朋友兼同事，文學院院長沈剛伯（1896–1977）。

臺灣大學原來是日本殖民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1928 年建立，與史語所同年。它的文政學部設有史學科，仿照日本國立大學體制，分國史（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南洋史及西洋史諸學門，設講座，由著名學者主持，如文政學部首任部長藤田豐八即是東洋史講座教授⁹。然

⁸ 參〈中國上古史編輯計劃的起源及其進行的過程〉，《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臺北：史語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1972），頁 i。

而由於學生人數有限，臺灣人尤其少，只有二名，所以日本的史學在臺灣並沒有生根，而當日本戰敗撤離後，臺北帝國大學的史學可謂完全斷絕，到1949年乃由從中國來的歷史學者填補這個空缺。

沈剛伯稍早就到臺灣，1948年應邀來臺灣大學短期講學，適逢國共內戰轉劇，遂留在臺灣，並且推薦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沈、傅兩人的交誼可以追溯到留學歐洲時期。1924年沈先生入學倫敦大學大學院，研讀埃及學及英國憲政史，1927年回國，亦任教於傅斯年所執教的廣州中山大學，不久傅離開中山大學去創辦史語所，沈亦轉任南京的中央大學，直到來臺為止。沈先生擔任臺大文學院院長長達二十餘年，到1972年才退休。當時臺灣的大學少，臺大又是臺灣最著名的大學，所以1970年臺灣培養出來的人文學者，多少皆受到沈先生的影響。

關於沈剛伯的史學思想，針對史語所建立的歷史研究規範，首先他認為史料並不一定可靠，即使日記和書信等第一手資料也不例外，而且無法求備求全；要以如此具有先天缺陷的資料建立精確如自然科學的歷史學，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同意歷史家的任務在求真，但他更體認從史料到歷史「真相」過程的複雜性，其中難免受到歷史家有意或無意的



沈剛伯像

關於沈剛伯的史學思想，針對史語所建立的歷史研究規範，首先他認為史料並不一定可靠，即使日記和書信等第一手資料也不例外，而且無法求備求全；要以如此具有先天缺陷的資料建立精確如自然科學的歷史學，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同意歷史家的任務在求真，但他更體認從史料到歷史「真相」過程的複雜性，其中難免受到歷史家有意或無意的

⑨ 參陳偉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簡介〉，<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academic/nol-ch2.htm>；林秀美，〈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簡介〉，<http://info.ntu.edu.tw/alumni/index6/photo.htm>。藤田豐八事略參看〈羅振玉書藤田博士墓表〉，《劍峰遺草》（東京：三秀舍，1930）。